

常言道:“盛世收藏,乱世经商。”在文化圣城曲阜,就有一家以收藏历代科举文物为主的民间博物馆——中国状元文化博物馆。它位于曲阜市明故城城墙内,收藏了历代的考卷、皇榜、圣旨、牌匾等珍贵文物1800多件,系统展示了古代莘莘学子的状元之梦和状元之路。

在该馆第一个展台陈列的是清同治七年(1868年)洪钧状元及第匾、光绪三十年(1904年)朱汝珍榜眼及第匾、乾隆五十四年(1789年)刘凤浩探花及第匾。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就是殿试的冠军、亚军、季军,这前三名合称三鼎甲。这三个人相距万里,时差百年,能将三鼎甲匾集全实属难能可贵。

洪钧“状元及第”匾,本悬挂于苏州洪钧的“状元府”门楣上,“文革”初期不知去向,等到它再次出现时已是在日本的东京。馆长刘晓赅转打听得知后,在当地华侨和留学生的帮助下,出资5万美金抢救回国。该匾高165厘米,宽84厘米,红地金字,四围饰以二龙戏珠、龙凤呈祥等古朴图案,正中上方有“奉旨”两个楷书小字,正中为“状元及第”四个金色大字,上款为“同治七年岁次戊辰科”字样,下款驳蚀。经查证该科状元为大名鼎鼎的清廷驻俄、德、奥、荷四国大臣洪钧。

在排列有致、分门别类的众多藏品中,有块进士匾引来不少学者的热烈讨论与争议。

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周东升

## 曲阜有座状元博物馆

代特有的披灰工艺,呈现暗枣红色。牌匾正中榜书“进士”两个楷体大字,上款小字题为“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夏寅书”,下款为“大明天顺丁丑科黎淳榜进士方中”。天顺丁丑年即1457年,距今已有整整560年的历史。

这块历经劫难的牌匾是馆主从江西淘得,据说“文革”时期被造反派破“四旧”从黎淳后人家中抄走,眼看就将付之一炬,由于它做工精细,材质优良,而且块大方正,就被生产队长截留下来,当作了仓库的门板,才得以逃过焚毁。但自此也就多出了几个“面向工农”、“伍号”等当地百姓的涂鸦之作。

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黎淳是该榜状元却敕颁一方“进士”匾。经过考证,原来在明朝初期,殿试结果划分为三个档次,称为“三甲”。其中第一甲为三人,叫“进士及第”,分别

称状元、榜眼、探花;第二甲若干人,叫“赐进士出身”;第三甲若干人,叫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当时朝廷并没有将“状元”作为殿试第一名的专称,因此黎淳得到的也是一块“进士”匾。

也有些专家、学者对此提出异议,认为这是黎淳同榜进士方中的牌匾。产生异议的根据便是牌匾上所题的“大明天顺丁丑科黎淳榜进士方中”下款。黎淳榜进士或某某榜进士,是古代科举考试的科别标签,一般习惯于以该榜的第一名即状元名字来标明科别。既然黎淳为该榜状元,所以标称为“黎淳榜”。

这种歧义并非没有道理。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记载,黎淳与方中的确为同榜进士。黎淳(1427—1491年),字太仆,本姓杨,后随姑父姓黎,今湖南省华容县胜峰乡龙秀村人。明英宗天顺元年(1457年)丁丑科状元,授翰林院修撰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;方中,字大本,浙江省严州府淳安县富山人,系黎淳榜第三甲第120名,即总体排名第220名。历任玉山县知县、南官县知县、监察御史、贵州按察副使等职。

一方承载古代学子艰辛与荣耀的进士牌匾,竟能引发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探究,我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影响之深远,状元文化内涵之丰富,由此可见一斑。而这,也恰恰是民间博物馆方兴未艾的意义所在。

【往事】

## 64年前,俺过的儿童节

□张庆国

“六月里花儿香,六月里好阳光。六一儿童节,歌儿大家唱……”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一代队歌。64年前我10岁,当上少年先锋队队员,胸前戴着红领巾,雄赳赳、气昂昂放开喉咙歌唱的,就是这首队歌!俺们唱着它,提着瓦罐抬着水桶,每天早晨给孤寡老人去井台打水;下课后,背着筐拉着小车往地里给残疾人送粪。每年六一儿童节,打着队旗集体上街游行,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。

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结束后,战败了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不惜使用细菌战。我国人民愤怒声讨的同时,大力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。1953年的六一儿童节,我上学的德县曹村区纪家店乡完小全天没有上课。上午,段金龙老师(他是乡联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)带领学生上街游行,少年先锋队的队伍打着队旗,昂首挺胸地高唱:“消灭细菌战,捉拿细菌战犯,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,一齐动员,一齐动员。”上午走了纪家店、张牌庄、胡官营、头百户四个村,到了下午一点才回到学校。

午饭后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,全校翻箱倒柜大扫除,旮旯见见不留死角。打扫完学校,学生们主动走上学校驻地纪家店村,清扫大街小巷。联校团支部要求少年先锋队带头,每个队员两天之内,至少打死200个苍蝇,消灭1只老鼠。6月3日一早来校交纳实物,按战果评出一二三等。

立夏之后,正是苍蝇繁殖的季节。那时,有窗纱竹帘的人家少,室内室外苍蝇乱飞,消灭200个苍蝇应该不成问题,实际不然。没有现成的工具,蝇拍自己做,有的剪半截鞋底钉到木棍或竹棍上,有的钉块纸板。鞋底纸板不透气,举起来一股风,还没有落下去,苍蝇惊慌飞走,自然打不死。纸板上钻些洞,好是好,就是纸板爱折,打三五下蝇拍就会坏。队员们为了完成任务中午不休息,去厕所粪坑猪圈牲口棚苍蝇多的地方打,用镊子把死苍蝇捏到纸盒或玻璃瓶里保存好等着过数。

最难消灭的是老鼠,消灭多少的证据是交老鼠尾巴。当时没有药死老鼠的药,逮老鼠的工具是老鼠夹子老鼠笼。支到老鼠洞前,老鼠狡猾,放的诱饵再香,它不一定上当,谁也不敢保证两天之内准能逮着一只。不少人家养着猫,可猫喵喵一叫老鼠不敢出来。只有同学孙玉萍洋洋得意,因为她的猫每天逮到老鼠叨到她面前报功,她不在家时把老鼠扔到住屋的角落里等着她。年纪超过十八岁的女同学商荣英足智多谋,几个女队员找她讨教,她给大家出了个主意。几个女生分头打听村里的老农,五点多放学,扛着铁锨担着水桶下地,直奔田鼠洞。清理好田鼠拱出来的土,掘几锨找到洞口往里灌水,首战告捷,头一个洞就灌出两只大老鼠。大家兴高采烈,灌田鼠的劲头更高,第二个洞没掘几锨,掏出老鼠藏在里面的十多斤粮食。第三个洞里没有发现大老鼠,掘到五个蜷曲在毛茸茸老鼠毛里的“光腚”。张金洲拿着铁锨欣喜地喊:“一个洞完成了五个人的任务。”

我回到家就往前街张金福四哥家借老鼠笼,四哥跟着我来家,帮我支到粮食囤旁。一宿没有老鼠光顾,我正发愁,四哥提着只死老鼠给我送家来,原来他是在牲口棚里用夹子帮我捉到的。

我那时当少先队大队长,6月3日早晨验收,段老师忙不过来,让我帮他点数。程何庄的吴金才打了351只苍蝇拿到冠军,前小屯的尚淑华参加灌田鼠,交上三根老鼠尾巴。养猫的孙玉萍提着只死老鼠来学校最晚,我见她手上缠着纱布,问她怎么回事?她哭丧着脸告诉大家,她从猫嘴里拽老鼠,平日对她百依百顺的狸花猫突然使性子挠了她一爪子。

六一过后曹村区教委评比,纪家店少先队夺得第二名。

【老照片】

## 兵团农场的拖拉机手

□李强

1970年初,父母所在的机关开始酝酿干部“走五七道路”,即全家被下放农村。父亲深知他既是“走资派”,又是“站错队的人”,与其全家都被安置农村,还不如尽量给孩子找一个稍好的出路,于是便通过原驻机关的军代表田叔叔的关系,将我和大弟弟安置到了济南军区山东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。

我与弟弟同被分配到三营(齐河县宣章公社),或许我由于表现较好,不久便被调至后勤连学开拖拉机。这是一个当时令全营人羡慕的工作,每当我开着“东方红”履带式拖拉机轰轰隆隆地驶向大田作业时,总能赢得人们好奇与羡慕的眼光。

拖拉机班的人住在营部里,“三秋”“麦收”之际有时营长直接到班里询问耕作的进度,安排工作,忙完全营活计后有时还要到驻地大队帮助耕田。

拖拉机手工作之艰苦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“三秋”大忙时,天黑前就得到地头接班,然后灌满一大箱柴油,在辽阔的大田里耕地、耙地……劳碌一整夜,“歇人不歇马”,只有在子夜时分吃夜班饭时稍稍喘息一会儿。偷懒磨滑自然是甬想,因天刚蒙蒙亮时营长早已站立在地头,你干了多少?质量如何?哪能逃得过他那双“农业专家”的慧眼。记得1971年国庆节之夜,我就是与战友驾驶着“铁牛”在大田里度过的。

此照片摄于1970年底,老班长黄一青(前排右二)将调到淄博工作,笔者(前排左一)与战友们来到麦田里,合影留念。47年过去,当年十七八岁的毛头小伙如今都已年过花甲,然而这段激情似火的青春岁月却将永驻心间。



提起粮票,现在的孩子大都不知所云。但在我的小时候,粮票之于每个家庭都是必不可少的东西——买面、买粮要粮票,去副食品商店买点心要粮票,更不必说出门远行了,必须带足了粮票,否则,拿着钱也买不到食品。

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,面额则从一两、半斤,到五斤、十斤不等。全国粮票不用说了,自然是全国通用;地方粮票则五花八门,不仅印制的形式花样繁多,面额也各有不同。粮票虽然只是购粮的凭证,本身并不具有价值,且不许在市场上买卖流通。但在我上初中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粮票不仅可以直接交易商品,而且粮票本身也可以私下买卖,甚至每张面额不同的粮票都有不同的明码标价。

我从小喜欢读书,初中时已算是一个资深的爱书人了。当时与我同样喜欢读书藏书的,还有一位名叫赵飞的同班同学。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,

【旧时光】

□王淼

## 全国粮票

我和他自然非常要好,我们一起泡书店,交换各自的课外书,语文成绩也差不多,在班级内都是遥遥领先,只是理科学得一塌糊涂,也就是一般老师形容偏科学生时所说的“瘸腿”吧。

那时候买书,最让我们作难的,首先是没钱。我的父母和赵飞的父母工资都不高,他们养家尚且捉襟见肘,偶尔给些零花钱,当然远远不能满足

我们对书的占有欲。而谎称“学校要收什么费”,一次两次还管用,用得多了,也总有露馅的时候。所以,书店不进新书,我们常常盼着,一旦书店进来新书,又会陷入无钱购买的尴尬境地。情急之下,不免东挪西凑,只要一书到手,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但即便如此,仍然还是会与许许多多喜欢的书籍失之交臂。

应该是1979年冬天吧,我们盼望很久的一套书——巍巍的《东方》终于在小城的新华书店上架了。一套三册,当时的定价只有两块三毛钱。但是,两块三毛钱对于我和赵飞,却已经是一个不菲的数目了,我们分头筹措,最终所获寥寥。正当我感到一筹莫展之际,赵飞突然跑过来告诉我:“别愁了,我家有全国粮票。”“全国粮票能当钱用?”我还是半信半疑。“你就别管了,看我的。”赵飞很自信地说道。

原来,赵飞此前不仅已经侦察好家中放置粮票的地方,

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打探得一清二楚。那是一张面额五斤的全国粮票,据赵飞说,可以卖到两元钱,而余下的三毛自然好办。傍晚时分,我和赵飞小心翼翼地带着粮票,来到一个偏僻的十字路口,站在昏黄的路灯下守候。果然,不大一会儿,便有一个中年男人过来和我们搭讪。他带我们走到暗影处,并用手电筒仔细审视了我们所带的粮票。经过一番简短的讨价还价之后,这张面额五斤的全国粮票最终以一元八角的价格出手。回忆彼时情境,与我经常在电影上看到的地下工作者之间接头的情节约略仿佛。

但不管怎样,《东方》终于到手了。我不知道赵飞是否因此受到父母的责骂,但那套《东方》却着实让我们兴奋了一阵子。有了这次经历,后来在外地上学,我还如法炮制,偷偷卖掉了家中所藏的国库券,从而获得一套装帧精美的《全宋词》。